

近代「數字卦」研究考述

陳詠琳*

【摘要】

所謂的「數字卦」，乃指出土文物上某種奇特的卜筮符號，有學者表示這些符號為數字，並將之與《周易》連結，遂使此類符號有「筮數易卦」之稱，為一門新穎的易學研究議題。張政烺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把這些數字皆轉換成《周易》六十四卦，並接連發表三篇論文，系統性地建構「數字卦假設」。

在「數字卦假設」提出的前後二十年間，中國各地的考古團隊陸續挖掘出刻畫有此類卜筮符號的出土文物，學者們掌握的材料越來越多，足以對「數字卦」展開進一步的了解，在樓宇棟、張亞初、李學勤等人的推動下，學術界掀起一股「數字卦」研究熱潮。然而，張政烺雖然替「數字卦」建構了相當程度的學說體系，但其終究只是個假設，未必就是正確的客觀事實。因此，也有一些學者從其他角度切入反思，對「數字卦」論點的內在問題提出質疑。

至今，「數字卦研究」已風行三十餘年，擁有可觀的學術積累，但因學者們皆埋首於「數字卦」符號和文物本身的研究，甚少有人去整理唐蘭、李學勤、張政烺等開創者及三十多年來學者對「數字卦」議題的研究成果，以致「數字卦研究」顯得片面、零散，讓人不得其門而入。有鑑於此，本研究便以此為主題，試著去梳理近代「數字卦」的出土概況和研究歷程，並簡述其學術流變與反面見解，以作為近六十年來「數字卦研究」的回顧。

關鍵詞：數字卦、筮數易卦、卜筮符號、出土材料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壹、「數字卦」研究的緣起

「數字卦」為刻畫在古代文物上的奇特符號，最早發跡於北宋，但當時卻無人能明其意，故探討者寥寥無幾，之後便迅速衰微，甚少有人再談起。直到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河南、陝西等地區所挖掘到的古代文物中，出現了幾組此類型的符號，「數字卦」才又重新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但仍然沒有學者能夠解釋這些符號究竟為何？可喜的是，「數字卦」的相關研究已不再停滯，而能持續性地進行，歷經二十餘年的醞釀，遂使張政烺先生得以融合諸家之說，大膽提出「數字卦假設」，此創見震撼了學術界，再加上地下文物陸續出土，促使兩岸學者在近三十年間，掀起了一股「數字卦」熱潮。「數字卦研究」實可謂近代易學研究史的一項重要特點。

一、起源於宋代「南宮中鼎」銘文

宋朝的王黼與一批官員曾共同編纂《宣和博古圖錄》一書，此書記載了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湖北孝感縣出土的「安州六器」銘文。「安州六器」六器之中的「南宮中鼎」，有某段銘文記載如下：

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貺土。王曰：「中，茲福入事，錫于玟王作臣。今貺畀汝福土，作乃采。」中對王休令，鬻父乙墜。惟臣

尚中臣。。1

此段銘文的大意是：周昭王把周朝一部份的領地「福」²，賞賜給有功的諸侯「中」。³ 為了表示紀念，「中」自行鑄造了「南宮中鼎」，並將此事雕刻在「南宮中鼎」上面。宋代學者在注解本文內容時，並無太大的歧見，但銘文末尾出現的這兩組符號，卻讓人不明究理、難解其意，因而產生諸多不同的說法。例如：王黼把這些符號注釋為「赫赫」，如同「赫赫師尹」之義，同時期的王俅則解釋為「十八大夫、八大夫」⁴，但這種與前文內容毫不相符、強行附會的論點自然難以服人。然而，歷代（元、明、清三朝）以來，囿限於出土文物的不足，一直未能出現更合適的見解。唯有宋人薛尚功認為這些符號與《周易》的「九、六之數」和「制器寓象」之說有所關連⁵，實可謂慧眼獨具，但薛氏也僅僅只是揣測，並沒有再去進一步的探討與闡述，更無法提出具體而有力的論據，故宋代的「數字卦研

¹ 參閱〔宋〕王黼：《宣和博古圖》卷二。

² 李學勤曰：「安州六器是中所作銘功報先的祭器，出土的地點孝感，應該就是中受封的福地。」引自李學勤著：《周易經傳溯源·考古發現中的筮法·中方鼎與《周易》》（高雄：麗文文化，1995年10月），頁204。

³ 「中國」為姬姓，是周王的同姓諸侯國，熟悉周朝勢力與地理環境，且國力較為強盛。因此，周王南征時，「中國」為昭王最主要的依靠、協助對象，「中」可能就是這個諸侯國的領袖。參閱黃錫全著：《古文論叢》，頁68，引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與族屬〉，《江漢考古》第2輯（1984年）。

⁴ 參閱〔宋〕王俅：《嘯堂集古錄》卷上，收入《四部叢刊續編》。


⁵ 參閱〔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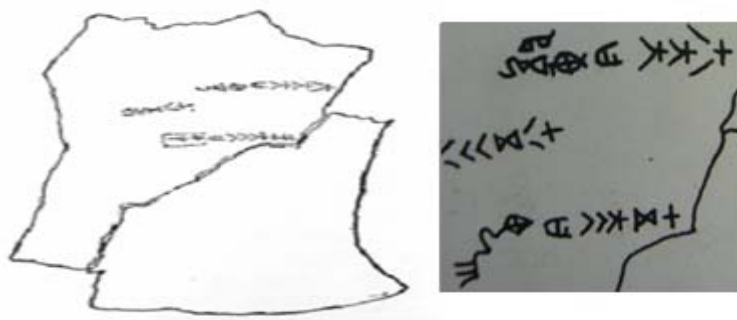
究」也只能發展至此，就此停滯。

二、醞釀於近代「出土材料」湧現

















資料不足的既定侷限，遂使「數字卦研究」被擱置了八百餘年，直到民國時期，古代文物大量出土，學者能透過多種地下材料與紙上文獻相互比對，進而得到新的見解。最早注意到這些符號的近代學者是郭沫若和唐蘭：郭氏認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反對宋代「赫赫」與「十八大夫、八大夫」之類的注解⁶；唐蘭亦指出宋人的論點錯誤：「把它們解釋成『赫』字是錯的，按銅器銘刻的一般規律，這兩個字在銘文最後，應該是氏族的名稱。」⁷ 與郭沫若的看法相似。以下便介紹幾項對「數字卦研究」影響甚大的出土材料與學說：

（一）四盤磨村與張家坡的卜骨

民國三十九年（195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陽殷墟四盤磨村所挖掘出的某片卜骨，上面刻有三組奇特的符號（請參見圖一）⁸，而這三組符號似乎和「南宮中鼎」銘文末尾的「」符號頗為形似。



（圖一：四盤磨卜骨）

到了民國四十五年（1956），中國科學院的考古團隊在陝西長安張家坡發現一批西周時期的卜骨，而這批出土材料裡面，竟然又再度出現「   」、「   」、「   」、「   」四組此類不知所云的奇特符號⁹，遂引起考古學界與古文字學界的注意。

（二）李學勤與唐蘭的推論

在四盤磨村及張家坡的卜骨出土後，李學勤先生便發表〈談安陽小屯以外出

⁶ 參閱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攷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

⁷ 引自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第2期（1957年）。

⁸ 參閱郭寶鈞：〈1950年殷墟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學報》第5冊；曹定雲：〈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第7期（1989年）。

⁹ 參閱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張家坡村西周遺址的重要發現〉，《文物參考資料》第3期（1956年）；以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灋西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

土的有字甲骨》一文，指出此類符號可能和《周易》的九、六之數有關¹⁰，為近代第一個串聯「此類奇特符號」與《周易》的學者，可惜李先生當時亦未就此展開論證。另一方面，唐蘭則全面蒐集相關材料，於民國四十六年（1957）發表〈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文中特別提出十三組此類符號（請見表一）討論，並就結果歸納四個重要論點¹¹，進而推斷這類奇特符號是用「數字」所組成的，為已經消失的古代文字（類似巴蜀文字，可能為少數民族文字）。若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重新審視，唐蘭這篇文章的論點其實出現不少錯誤，但卻能帶給當時的學者諸多啟發，具有開創之功。¹²

（表一：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十三組符號）

編號	符號	符號來源
1	十 八 人 人 人 人	北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 在湖北孝感發現的「南宮中鼎」銘文末尾
2	八 十 人 人 人 人	
3	十 𠄎 八	《三代吉今文存》卷三載錄的「中旂父鼎」
4	八 𠄎 一	《三代吉今文存》卷六載錄的「堇伯簋」
5	𠄎 八 人	《懷米山房吉金圖》載錄的「效父彝」
6	人 一 八 人 一 一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召卣」
7	二 人 二 一	
8	人 一 人 人 人 一	
9	人 八 二 十 一	1956 年張家坡出土的某塊卜骨
10	十 二 人 八 一	
11	十 八 十 人 十 人	1950 年四盤磨出土的卜骨上段
12	八 人 人 𠄎 八 十	1950 年四盤磨出土的卜骨中段
13	十 𠄎 十 人 人 人	1950 年四盤磨出土的卜骨下段

唐蘭認為這十三組符號都是由「數字」拼湊而成，若將它們加以統合、歸納後，

便能得到：「一（一）、二（二）、𠄎（五）、人（六）、十（七）、

八（八）」這六個數字。唐蘭這篇論文開啟了近代「數字卦研究」的大門，促使許多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陸續轉移原本的研究方向與焦點，一把「此類奇特的數字符號」作為自己的重點研究對象。

¹⁰ 參閱李學勤：〈談安陽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頁17。

¹¹ 唐蘭指出：「一、這類文字都是用數目字組成的；二、在周代，這些文字僅用於氏族名稱；三、從豐鎬遺址卜骨上看，這不是殷文字，也不是周部族先世的文字，可能是曾經住過現在豐鎬地域的一個民族文字；四、從四盤磨卜骨把殷文字和這種文字對照這一點來推測，殷代還有人熟悉這種文字。」引自唐蘭：〈在甲骨金文中所見的一種已經遺失的中國古代文字〉，《考古學報》第2期（1957年）。

¹² 參閱黃師忠天：〈漫談歷代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影響〉，《中華道教學院南台分院學報》第1期（2000年）。

（三）鳳雛村的卜甲文字

民國六十六年（1977），於陝西岐山鳳雛村挖掘出一萬七千片卜甲，而其中刻有文字的卜甲中，又有六片分別刻有「 \wedge 」、「 $+$ 」、「 \diagup 」等類似數字的符號，可惜有兩片已缺損難辨，只剩下四片卜甲的字形仍可辨識（見表二）：

（表二：鳳雛村所得四組卜甲符號）





	收錄卜甲編號	符號
1	7 號卜甲	\diagup $+$ \diagup $+$ \diagup \boxtimes
2	81 號卜甲	$+$ \wedge \wedge $+$ \wedge \wedge
3	85 號卜甲	$+$ \wedge \wedge $+$ $-$ \diagup
4	177 號卜甲	$+$ \wedge \diagup \wedge $+$ \wedge

隨著四盤磨村、張家坡與鳳雛村甲骨的發掘，學者已獲得一定的研究材料，足以對這些符號進行假說性的推論。李學勤揣測其與《周易》相關，唐蘭認定這些符號皆為「數字」，張政烺則結合李、唐兩人的論點，正式提出「數字卦假設」。

三、確立於張政烺「數字卦假設」

民國六十七年（1978），吉林大學於長春召開首屆中國古文字學學術討論會。徐錫臺於會議當場發表鳳雛村卜甲的挖掘報告，並將甲骨片上的「奇字」拿出來討論。與會的張政烺在看到這批新出土文物後，隔天臨時增加〈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演講，將鳳雛村四組卜甲符號與《周易·繫辭傳》的揲著之法互証，說明此類符號是古代占筮記錄：銅器銘文中的三個數字組合是單卦（八卦）；用四個數字組合的是特殊筮法；而六個數字則是重卦（六十四卦），數字看似繁雜，其實都能歸屬於陰陽二爻。遂秉持「奇數為陽，偶數為陰」之原則，當場把鳳雛村的四組卜甲數字轉換成《周易》六十四卦（參見表三），並解釋：卜甲上的「五、六、七、八」數字符號，或許就象徵著初始《周易》的老陰、少陰、老陽、少陽。

（表三：張政烺對鳳雛村出土四組卜甲數字的轉換）

	鳳雛村卜甲符號	代表數字與陰陽符號	《周易》對應卦
1	\diagup $+$ \diagup $+$ \diagup \boxtimes	八 七 八 七 八 五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水火既濟
2	$+$ \wedge \wedge $+$ \wedge \wedge	七 六 六 七 六 六 陽 陰 陰 陽 陰 陰	 艮為山
3	$+$ \wedge \wedge $+$ $-$ \diagup	七 六 六 七 一 八 陽 陰 陰 陽 陽 陰	 山風蠱
4	$+$ \wedge \diagup \wedge $+$ \wedge	七 六 八 六 七 六 陽 陰 陰 陰 陽 陰	 山水蒙

張氏之說得到張頴、洪家義等學者的發言支持，最後得到與會者一致鼓掌認可。民國六十八年（1979），徐錫臺、樓宇棟共同發表〈西周卦畫試說—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畫初探〉¹³，以張政烺「數字卦假設」為基礎，進而說明甲骨上不同奇、偶數組成的六畫卦，應該是西周早期真實的卦畫本形，為古代使用數字卜卦的痕跡，且特別援引民族學家汪寧生〈八卦起源〉一文的結語：「陰陽兩爻，是古代巫師舉行筮法時，用來表示奇數和偶數的符號，八卦則是三個奇偶數的排列和組合。」¹⁴來互相印證。

張政烺在得到學術界肯定後，便全心投入此議題，沉潛了兩年，戮力蒐集甲骨、銅器上的相關材料，整合後加以考證。在民國六十九年（1980）發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在正文中列舉三十二例，以作為自己「數字卦假設」的例證。¹⁵隔年（1981），張亞初、劉雨兩人在張氏的基礎上，再增補三十六例，並附有摹本。¹⁶隨後張政烺又發表該文之〈補記〉，又追加三十例，總共提出六十二例為佐證，並發表〈帛書六十四卦跋〉和〈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兩篇論文¹⁷，系統性地建立「數字卦假設」的理論架構。戴璉璋先生從張政烺這三篇學術論文中歸納出五大要點¹⁸，賴貴三先生在〈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一文修補其論述曰¹⁹：

- （一）金文中所見之數字組合，為古筮法中之「數字卦」。
- （二）目前所見之「數字卦」，有些可能出於新石器時代，而以出於殷、周二代者最多；亦有戰國、秦、漢時代之遺物。
- （三）六字卦出現最早，亦最為普遍；三字卦出現於殷、周時期，數量較少。
- （四）筮卦之數字，早期用一到八；殷以來，「三」以「一」記之，「二」、「四」以六記之；「九」則出現於西周中晚期。卜骨上「九」、「七」絕不同時出現。
- （五）上古筮法可能歷經多次改革，而最重要之改革，是將筮數歸納為奇、偶兩類，分別以「—」、「^」記錄。²⁰

¹³ 徐錫臺、樓宇棟：〈西周卦畫試說—周原出土卜甲上卦畫初探〉，收錄於《中國哲學》第3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¹⁴ 汪寧生：〈八卦起源〉，《考古》1976年第4期。

¹⁵ 參閱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61-580。

¹⁶ 參閱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

¹⁷ 兩篇文章皆收錄於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帛書六十四卦跋〉收錄於頁680-691；〈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收錄於頁714-723。

¹⁸ 參閱戴璉璋：〈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國文天地》（1988年2月）。

¹⁹ 賴貴三將戴璉璋的第三點拆成二、三兩點，而未述戴璉璋的第二點（據《尚書》、《周禮》、《左傳》等書，可知古人卜、筮並行，或先卜後筮，或先筮後卜。數字卦之所以刻在卜用的甲骨上，就是這個緣故）。參閱賴貴三：〈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典與文化的形成」》（2005年）。

²⁰ 引自賴貴三：〈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典與文化的形成」》（2005年）。

張政烺的「數字卦假設」理論一出，使考古學界、古文字學界、易學界均掀起一股「數字卦」研究風潮。至今，雖然熱潮已消退不少，但學術界仍不時會出現與「數字卦」研究相關的論文。其中值得省思的是，張政烺這套「假設」，並非客觀事實，曾有諸多學者紛紛從不同角度對「數字卦假設」提出反駁與質疑，張氏的「假設」是否成立？恐怕還有不少值得討論的空間。接著，下文將依照時間順序，列舉民國以來幾項對「數字卦研究」影響甚大的出土材料，以茲讀者查考。

貳、近代數字卦材料的大量出土

隨著古代文物不斷被挖掘出土，從新石器晚期的陶器、商周卜甲和銅器，乃至戰國楚簡、兩漢帛書等等，目前可見刻畫在甲骨、陶器、銅器、竹簡等上面的「數字卦」符號，大概已經有一百多例，學者也對各組「數字卦」符號作了闡釋，以下便列舉幾項較為重要者介紹：

一、甲骨

（一）河南安陽殷墟四盤磨村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 1950 年 4 月 12 日至 6 月 10 日發掘殷商故都安陽小屯村附近的四盤磨村。四盤磨村在洹南，距離小屯村兩公里多，是當年平民及低階貴族的居住區。四盤磨村西部 SP11 坑出土大卜骨三塊，其中有一塊以橫向刻畫了三行符號（請參見圖二）。張政烺等學者將此三行符號轉化為數字卦符號（請參見表四），並提出論點。




（圖二：四盤磨卜骨數字符號）

（表四：以「數字卦」對照四盤磨卜骨上面的符號）

	卜骨上面的數字符號	卜骨符號、文字之釋文
卜骨上段	十 八 十 八 十 八	七八七六七六曰隗 ²¹
卜骨中段	八 八 八 八 八 十	八六六五八七
卜骨下段	十 八 十 八 八 八	七五七六六六曰魁（或畏） ²²

²¹ 唐蘭考釋為「隗」。「隗」表示高山、高大，與「嵬」、「巍」相近。

²² 唐蘭、張政烺、徐錫臺皆以為「魁」代表首領。管燮初則言  鬼頭虎爪，古文「畏」，懼也、威也。

這片卜骨上段刻「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下段則刻「七五七六六六曰『魁』」。張政烺認為「魁」、「隗」兩字，就如同《周易》稱〈否〉與〈未濟〉，應當是筮書中某卦卦名。況且，「魁」、「隗」又位居篇章之起首，甚至有可能是此筮書的「書名」，猶如《歸藏》亦可稱為《坤乾》，「魁隗」很可能就是《連山》的異名：

它們（魁隗）配對湊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不像筮占的結果，而可能是一部策畫的篇首，被習刻的人刻在這裡。「魁」和「隗」當是卦名，猶《周易》稱這兩卦為〈否〉和〈未濟〉，按照古人的習慣，「魁」和「隗」列居篇首有可能成為這部筮書的書名。²³

管燮初則認為卜甲上、中、下段的這三行文句不符合卜辭通例，見其遺存狀況，似乎是一名尚在學習刻契者之住所。「隗」，表示高而不平，而卜骨上段的數字符號若經轉換後，為「〈未濟〉之〈訟〉」，與「曰『隗』」辭義相當；卜骨下段則是「〈否〉之〈晉〉」，與「曰『畏』」（畏，懼也、威也。）意思相同。因此，管氏推測「曰隗」、「曰畏」兩者應當隸屬爻辭，乃卜筮官對卦象所下的斷語。²⁴

（二）張家坡

在四盤磨村卜甲的大量出土之後，民國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1956-1957），中國科學院考古團隊和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又在西安張家坡豐鎬遺址發掘一批西周時期的卜骨，發現其中的兩塊亦刻有此類奇特的數字符號（請參見表五）。

（表五：以「數字」對應張家坡出土的卜骨符號）

某塊卜骨	二	△	二	—			二	六	二	一
	△	—	△	△	△	—	六	一	六	六
另塊卜骨	△	∥	二	×	—		六	八	二	五
	×	二	△	∥	—		五	二	六	八


由於四盤磨村和張家坡兩地所出土的甲骨文字太過奇特，遂使李學勤、郭沫若等古文字學家開始留意此類不知名的符號。唐蘭甚至藉此推論：這些「奇字」是用「數字」符號所組成。由此可知，四盤磨村和張家坡的兩次考古成果，是「數字卦」概念形成的基礎，可謂「數字卦研究」的源頭，不可略而不談。

（三）鳳雛村

民國六十六年（1977），陝西岐山鳳雛村甲組周初宮殿（宗廟）房基二號西廂房十一號窖穴，出土了一萬七千餘片的甲骨，加以清理後，仍保有「帶字甲骨」一百九十多片。這些「帶字甲骨」裡面，有六片卜甲刻有上述「奇字」，而六片之中又有兩片缺損，只剩下四片字形尚可辨識（已附於前文「表二」）。其中 85

²³ 引自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頁 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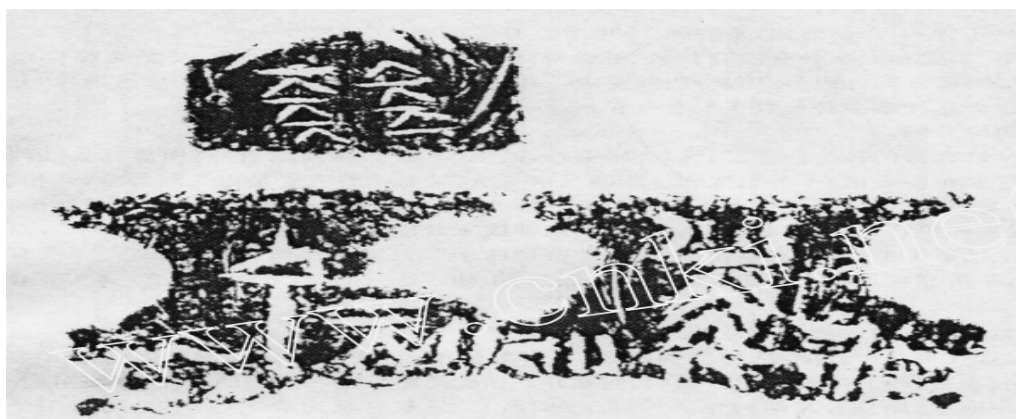
²⁴ 參閱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古文字研究》第 6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號卜甲上刻有「」等十二個符號，若將前面六個轉換為數字，為「七六六七一八」，而後面六者應是古文字：「日其亡咎既魚」。

二、長安西仁村陶拍

民國九十年（200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團隊在長安縣黃良鄉西仁村的北方，採集到四件時代下限不晚於西周末期的陶拍，其中某兩件上面有刻痕明顯、可供辨識的數字符號（請參見圖三）。小塊的那片有兩行，可分別解讀為「六一六一六一」和「一六一六一六」，若用「數字卦」的理論系統來轉換，則為六十四卦的〈既濟〉和〈未濟〉。另外一件則有四組符號，曹瑋和李學勤兩位學者皆同樣把它們轉換為《周易》的四個卦，卻因為解讀方向的不同，而產生分歧的見解。

（圖三：長安西仁村陶拍的「數字卦」符號）



（一）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

曹瑋先生認為此四個卦一分為二，右邊兩卦是由左往右刻畫而成，分別為「八一六六六六」、「八八六八一八」，為《周易》的〈比〉和〈師〉；左邊兩卦則是由右向左讀，為「一一六一一一」和「一一一六一一」，可轉換成〈小畜〉和〈履〉。曹氏又試著揣摩這塊陶拍的內容，認為是在祈求製造陶器的成功率。²⁵

（二）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

李先生則把這四個卦視為一個整體，皆由右向左讀，依序為「八八六八一八」、「八一六六六六」、「一一六一一一」、「一一一六一一」（即〈師〉、〈比〉、〈小畜〉、〈履〉），並指出「〈師〉之後為〈履〉」、「〈未濟〉尾隨〈既濟〉之後」與今傳本《周易》順序相同，故大膽推想：當時所用的卦序，恐怕與今相去不遠。²⁶

²⁵ 參閱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文物》第11期（2002年）。

²⁶ 參閱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第5期（2003年）。

（三）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

廖名春先生十分認同李學勤「當時使用的『數字卦』卦序與今傳本《周易》相同」之看法，並就此提出己見，再一次論述「數字卦」與《周易》的關係。廖先生的論點大致可分成兩個方向：1.「數字卦」是用筮數記爻，而不是僅以陰陽兩者標示，所以是一種「十位數字卦」，而非「兩位數字卦」。因此，筮數至少有一、六、八，肯定不會只稱九、六。2.此處的「數字卦」兩兩相對，且遵循《周易》六十四卦排列的變化規律²⁷，由此可得知今傳本《周易》當時便已存在，縱使內容必然有所差異，但應該是屬於同一系統。²⁸

三、戰國楚墓竹簡

（一）天星觀楚簡

民國六十七年（1978）的一月到三月，荊州地區博物館在江陵縣觀音壩公社五山大隊境內天星觀一號楚墓挖掘出竹簡七十餘枚（此處為楚國貴族陵墓區）。竹簡內容大致可分成「卜筮記錄」和「遺策」兩部分，尚可辨識者有八組十六卦，這些數字出現的次數為：一（37次）、六（49次）、八（5次）、九（4次）和某個殘缺字體（1次），全然不見二、三、四、五、七。戴璉璋先生曾解釋道：此現象表示「數字卦」使用的數字已經集中到「一」和「六」底下。此處的「八」或許是從「六」分出的，「九」則可能是從「一」化分而來，這便成為《周易》的前身。²⁹

史善剛先生歸納天星觀楚簡的卜辭釋文及卜卦，運用「奇數為陰，偶數為陽」的原則，並對照今傳本《周易》，轉換出各卦卦名及變卦性質，並列舉四個例子。³⁰ 筆者在此節錄其一：「〈咸〉之〈訟〉（三爻變）」作為參考（請參見表六）。³¹

（表六：天星觀楚簡符號與《周易》六十四卦對應關係）

簡卦原文	簡卦釋文	《周易》經卦	《周易》別卦 本卦之卦	變卦
<div> <div> <div>𠄎</div> <div>一</div> </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	<div> <div>八</div> <div>一</div> </div> <div> <div>一</div> <div>一</div> </div> <div> <div>一</div> <div>一</div> </div> <div> <div>一</div> <div>六</div> </div> <div> <div>六</div> <div>七</div> </div> <div> <div>六</div> <div>六</div> </div>	<div> <div>上</div> <div>上</div> </div> <div> <div>卦</div> <div>卦</div> </div> <div> <div>〈兌〉</div> <div>〈乾〉</div> </div> <div> <div>下</div> <div>下</div> </div> <div> <div>卦</div> <div>卦</div> </div> <div> <div>〈艮〉</div> <div>〈坎〉</div> </div>	<div> <div>〈咸〉</div> <div>〈訟〉</div> </div> <div> <div>   </div> </div>	三爻變

²⁷ 孔穎達曾歸納《周易》卦序變化之規律，即「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而已。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序卦傳》卷九，收入《十三經注疏》，頁186。

²⁸ 參閱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周易研究》第5期（2003年）。

²⁹ 參閱戴璉璋：〈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國文天地》（1988年2月）。

³⁰ 參閱史善剛：〈數字卦與簡帛易〉，《中州學刊》第6期（2005年11月）。

³¹ 另外三組：為〈解〉之〈姤〉（三爻變）；〈乾〉之〈噬嗑〉（四爻變）；〈坤〉之〈剝〉（一爻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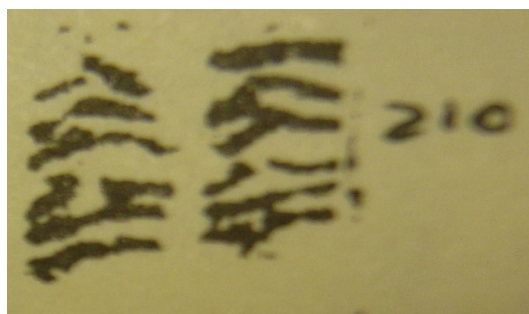
(二) 包山楚簡

荊門市十里鋪鎮王場村，有一座名叫「包山大冢」的土崗，此地便在天星觀楚墓之北約略十六公里處。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團隊於民國七十五年（1986）十一月至民國七十六年（1987）元月在此地發掘出九座墓葬，學者稱之「包山楚墓」。其中二號楚墓所出土的竹簡有 448 枚，留有字體者總計 278 枚。由於「包山楚墓」與「天星觀楚墓」的時間、空間皆極為接近，故出土的竹簡性質也就頗為相似。依使用類型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文書」，內容涉及戶籍登記和獄訟案件；第二種是「卜筮祭禱紀錄」，內容多為占卜以問病情之事；第三種是「遺策」，乃死者的陪葬品清單。下文以具有卜筮行為的第二種「卜筮祭禱紀錄」作為探討對象。

包山楚地竹簡的格式一般包含「前辭」、「命辭」、「占辭」、「禱辭」和「二次占辭」（祭禱鬼神後所得的判斷）五部分。其中有六組兩兩併列的「數字卦」，此六組竹簡的編號分別為：201、210、229、232、239、245。史善剛先生對包山楚簡亦有所整理³²，在此節錄編號 210 圖片（請參見圖四），以及對照表（請參見表七），以供參考。³³

（表七：包山楚簡編號 210 所載錄符號與《周易》六十四卦對應關係）

簡組編號	簡組原文	簡組釋文 本卦之卦	《周易》經卦	《周易》別卦 本卦之卦	變卦
210	△ 一	六 一	上 上	〈臨〉 〈損〉 	一爻變
	△ △	六 六	卦 卦		
	△ △	六 六	〈坤〉 〈艮〉		
) () (八 八	下 下		
	— —	一 一	卦 卦		
	— —	一 一	〈兌〉 〈兌〉		



（圖四：包山編號 210 竹簡）

不論「天星觀楚簡」或「包山楚簡」，用傳統《周易》卦象雖可解釋，但與楚簡卜筮所記載的斷占辭語相比，往往有結果不相合者。于萐先生認為兩兩併列的數

³² 參閱史善剛：〈數字卦與簡帛易〉，《中州學刊》第 6 期（2005 年 11 月）。

³³ 另外四組：編號 229 對應為〈否〉、〈蠱〉（四爻變）；編號 232 對應為〈離〉、〈隨〉（三爻變）；編號 239 對應為〈无妄〉、〈頤〉（四爻變）；編號 245 對應為〈需〉、〈恆〉（四爻變）。

字組合，若從《左傳》、《國語》的用筮方法來看，應是變卦的「本卦」和「之卦」³⁴，可以用象數易學的「互體說」³⁵求之。說明了「天星觀楚簡」和「包山楚簡」所呈現的「數字卦」順位，應是比照《周易》初、二、三、四、五、上位之次序，而且也已經開始運用「變卦」、「互體」等較複雜的方式來進行占卜。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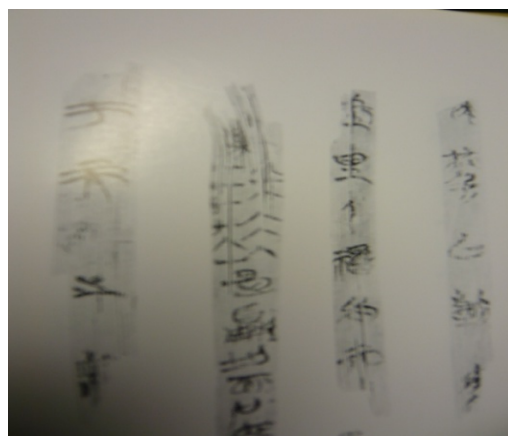
（三）葛陵楚簡

民國七十四年（1985），河南省新蔡縣文物保管所進行全縣文物普查時，在葛陵故城東北部發現兩座大型的古代墓葬。根據考證，葛陵故城可能是「平夜」的封邑，墓葬即為楚國封君「平夜君成」的埋葬處。

葛陵竹簡內容大多是墓主平夜君成生前的卜筮祭禱紀錄，占卜內容以求問病情為主，「葛陵楚簡」的格式與「包山楚簡」相似，但敘述方法仍有些許不同。比如，包山楚簡的「命辭」大部份都在某為某貞之後，內容直接敘述貞問事由；葛陵楚簡則會明確解釋貞問原因。然而，由於盜墓者的破壞，竟使葛陵竹簡殘破不堪，完整被留下來的篇章顯得頗為稀少，而記有數字符號的竹簡，更是斷簡殘篇、難窺究竟（請參見圖五、圖六）。



（圖五：葛陵楚簡乙四：102）



（圖六：葛陵楚簡零：115、22）

商代的甲骨與戰國楚陵墓的竹簡，兩者地域原本就不同，且又相距數百年之久，故兩者的卜筮程序、儀式、器具、方法，甚至是筮書的內容等等，必然會有諸多歧異，史善剛先生便指出：

殷商以來的所謂「卜筮不過三」、「三人同卜」或「一事一卜」的卜筮特點。到了戰國時，如包山楚簡易卦，則出現了卜辭一則、卜卦兩兩一組的新卜法。這一發展演變跡象，乃《易經》一書誕生之後出現的一個新變化。³⁷

³⁴ 關於「本卦」、「之卦」，參閱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4。

³⁵ 「互體」：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

³⁶ 參閱于蔭：〈包山楚簡的數字卦〉，《北方論叢》第2期（2005年）。


³⁷ 引自史善剛：〈數字卦與簡帛易〉，《中州學刊》第6期（2005年，11月）。

雖然史先生的說法還有待考證，但也替殷商到戰國這段將近千年時間所產生的筮法變化情形，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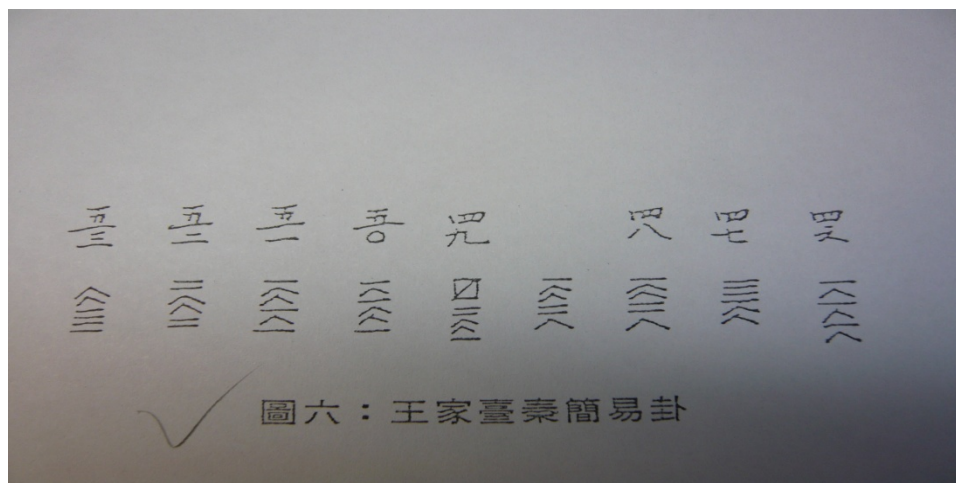
四、王家臺秦簡

民國八十二年（1993）三月，在江陵縣荊州鎮王家臺，出土秦、漢墓葬十六座，並在第十五號墓挖出大批竹簡，其數量高達八百餘片。此批竹簡的內容、格式較為特殊，可分為「卦畫」、「卦名」和「解說之辭」三部分。若從卜辭內容考察，其大多採用古史中的占筮之例，尚可辨識的「數字卦」符號約有五十餘個（請參見圖七），其中不免有所重複。而在「卦名」的部份，竹簡所見卦名幾乎都與今傳本《周易》相同。³⁸ 以下列舉編號 182 簡為案例說明（請參見表八）：

（表八：王家臺秦簡編號 182 與《周易》六十四卦對應關係）

秦簡編號	秦簡原文	易卦釋文	奇陰偶陽 轉換	《周易》對應	秦簡易卦
182	一 一 一 一 人 一	一 一 一 一 六 一	陽 陽 陽 陽 陰 陽	 天火〈同人〉	〈同人〉

（圖七：王家臺秦簡編號 46 到 53 的「數字卦」節錄）



從竹簡上面的符號來看，王家臺秦簡所刻的符號仍是以「一」、「六」組成的「數字卦」。若考察「數字卦」演進史：自殷商至西周末，自從形成「重卦」後，往

³⁸ 若見卦名不同，大多只是因為通假現象。例如：編號 471 秦簡作「毋亡」，即《周易》〈无妄卦〉之假借；此外，另可見秦簡中的「柰」字，為《周易》六十四卦中「泰」字之假借。當然也有文字真正不同者，譬如編號 213 秦簡雖是對應《周易·既濟》，而秦簡易卦作「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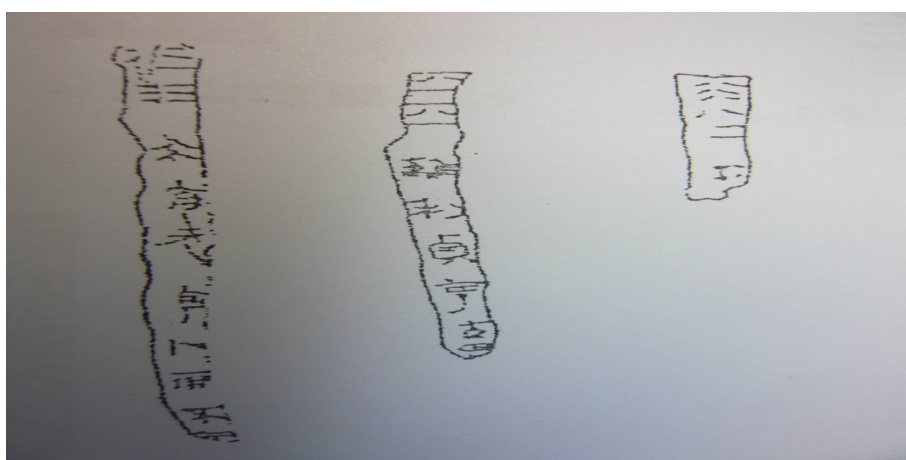
往是以「一」、「X」、「⊗」、「^」、「+」、「卐」、「九」等幾個奇偶數組合而成，但到了《周易》定型、普遍流傳的戰國時代，「一」和「^」就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從「包山楚簡」到「王家臺秦簡」的數字演變情況，應可被視為「數字符號卦」逐漸趨向統一化的肇始時期。

王家臺竹簡雖有單一的三畫卦，但無「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卦序結構；也僅具簡單的史官卜筮文辭，而沒有六爻之爻辭。竹簡內容包括炎帝、黃帝、禹、啟、夏桀、商紂、周武王、穆天子等故事，可謂一部從遠古到上古的神話史書。儘管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但對於目前古代易學、史學研究的價值堪稱獨一無二。

五、雙古堆漢簡

民國六十六年（1977），安徽省阜陽市博物館在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中發掘出大批竹簡，但殘破嚴重，字跡模糊，整理起來相當困難，但仍不失為數量眾多的簡書佚籍。墓主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竈（卒於文帝 15 年），內含三百多片與《周易》有關的破碎簡片，卦畫符號則寫在各簡片起首的位置（請參見圖八）。















（圖八：阜陽雙古堆漢簡易卦）



經過整理後，還殘存可解的「數字卦」只剩下：「 $\overline{\text{六}} \equiv$ 」〈大有〉、「 $\overline{\text{三}} \equiv$ 」〈離〉、「 $\equiv \equiv$ 」〈林〉、「 $\overline{\text{六}} \equiv$ 」〈大過〉、「 $\equiv \equiv$ 」〈賁〉五組。每一卦的卦辭和爻辭後面，皆有許多詢問日常事務的卜辭，比如病情、婚嫁、產子、商賈出入、居家吉凶等。

六、馬王堆帛書《易經》

帛書《易經》發現於民國八十二年（1973）十二月，湖南省長沙市郊馬王堆三號漢墓東邊箱的一漆盒內，帛幅卷首為《周易》六十四卦，接續有一篇佚書，

內容有卦畫「」、「」等類似「數字卦」的符號。張立文先生曾就此提出例證論述「數字卦」和帛書《易經》可能蘊含著某種關聯：1. 在帛書《易經》中，陽爻作「」、陰爻作「」，類似「數字卦」的「」、「」，從這兩者之間足以窺見「易學卜筮系統」的演化痕跡：從「數字卦」的六（）、八（或）演化成帛書《易經》的「」，再轉變為今傳本《周易》的「」。2. 帛書《易經》的〈坤〉作「川」（卷後佚書和〈繫辭傳〉所載均是），「川」、「」二字在古代相通，秦始皇未統一文字前，六國各地寫法皆有所不同，而「數字卦」從「」變成「」，可能便象徵著由六國文字轉化為秦隸的過程。³⁹ 是知「雙古堆漢簡」不僅蘊藏了帛書《易經》與「數字卦」之間的聯繫關係，也能夠藉此探討：從「數字卦」符號到《周易》文本定型這段時間的陰、陽爻畫演變現象。

參、學術界對「數字卦假設」的質疑

在張政烺「數字卦假設」提出後，又出土了大量刻有數字符號的文物，遂使「數字卦研究」風靡一時，不論是易學界、考古界、古文字學界，甚至是從事民族學的研究者，皆蜂擁投入「數字卦」的研究行列。然而，出現在古代文物上這些不可解的數字符號，難道真的能夠完全以「數字卦」來概括嗎？張政烺已經替「數字卦」建構了一定的理論體系，又加上贊同「數字卦假設」的學者不斷旁徵博引、加以舉證，在多次研究成果的累積與強化下，讓張政烺的「假設」幾乎牢不可破，促使「數字卦假設」已成為學術界對此類數字符號之共識。另一方面，仍然有部份學者從其他角度切入思考，並提出一些「數字卦假設」的內在問題，認為不應該把這類數字符號強行附會到《周易》的卦、爻系統中。

一、「數字卦假設」本身的隱含問題

在張政烺等人的影響下，學術界目前對這些出土符號最普遍的簡稱即為「數字卦」，但也有「奇字」、「卦畫」、「筮數」、「易卦」、「筮數易卦」等不同名稱。這些不同的稱謂，顯示部份學者對此類符號仍有認識上的差異。邢文先生便說：「對於所謂的數字卦，我們在其名稱與概念上從來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⁴⁰ 至今，學術界尚未有一個能完全讓眾人信服的名稱出現，乃因學者對這些材料的看法仍各持己見，此還待更多材料出土方能互相佐證。目前學術界使用得最廣泛的是「數字卦」一名，乃因張氏確立了一套頗為完備的假設理論。然而，這套體系建構雖然看似合理，但其實在各個推導過程中，理應要有一些必要條件需要先去

³⁹ 參閱張立文：《周易帛書今注今譯》（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

⁴⁰ 文中所提的幾種數字卦別名，摘自邢文對數字卦名稱與概念的整理。參閱邢文：〈數字卦與周易形成的若干問題〉，《臺大中文學報》2007年12月第27輯，頁7-11。

滿足，張氏卻未多言之。「數字卦假設」的轉換程序如下：

第一步：先將此類卜筮符號換成數字。

第二步：再將數字分為奇數、偶數兩大類。

第三步：將奇、偶數改為《周易》之陽爻、陰爻。

第四步：用所得爻去對應《周易》六十四卦。

首先，暫且不討論《易》是否源於「數」？就算《易》著實始於「數」，也無法將「甲骨上面的數」和「《易》所源的數」，做一個直接連結。更何況，學術界也不能完全確定此類卜筮符號即是數字，此為「第一步」的隱含問題；即使先假定此類卜筮符號為數字，接著看「第二步」：這些「數字」符號，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中，只是一種圖案性的文字？或者是已具備數學「計量性」的符號？尚不可知。張政烺將數字分成奇、偶兩種，把連續數字作了整理及分類，但商、周時期是否已經具備將數列歸類的數學概念？此恐怕還須探討。最後，中國古代的卜筮並非只有一種，此類卜筮符號雖然有可能屬於「易」之體系，但目前沒有材料能完全證明。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步」和「第四步」直接將此類卜筮符號與《周易》的卦、爻相連接，實在有些武斷。

二、學術界對「數字卦假設」的批判

「數字卦假設」的四個步驟太過簡化，因而忽略許多潛藏的問題，造成論證基礎不穩。⁴¹ 學者們對「數字卦假設」的質疑、批判，甚至是駁斥，也都是從此處衍生而來，以下便根據此四大步驟的隱含問題簡述之。

（一）與殷商時期數字認識史相違

若要假設商朝人真的是以「數字符號」來進行占卜，那至少得滿足兩個必要條件：一、確定「當時的人已具有明確的數列概念」；二、確定「當時的人已能區分奇數、偶數」，否則很難說得過去，王化平先生便以數學發展史的角度提出「數字卦假設」的矛盾：

殷商甲骨中，存有多片刻有數字，且按奇偶性分列書寫的甲骨。其排列有多種方式，這表明，殷人對數字奇偶性的認識還處在探索過程中。因此，從數學史的角度看，殷人將奇偶性應用於占筮的可能性不大。⁴²

根據甲骨顯示，殷商人的確已經具備「一」到「十」的文字數列。但若要說他們已掌握數字計量性質，且能清楚區分奇、偶數，甚至還應用於占筮，恐怕就跳過

⁴¹ 「第一步」立即轉換卜筮符號為數字；「第二步」逕自認定此「數字」具有量化性質；「第三步」直接把數字分成奇偶數，並轉換成「易」的陰陽系統；「第四步」理所當然地去對應《周易》六十四卦。

⁴² 引自王化平：〈數字卦兩點思考〉，《求索》（2005年12月）。

太多環節。王先生從古人對數字的認識尚未成熟這點切入，指出商代以「數字卦」進行占筮的可能性並不高。

（二）占筮符號有不屬於六畫卦者

張政烺假設的「第三步」和「第四步」是直接將此類卜筮符號對應《周易》。然而，《周易》僅有「三畫卦」與「六畫卦」兩種組合，但「數字卦」卻出現了四畫、五畫、十二畫、十三畫等不同的畫數組合，劉大鈞先生在《大易集說》曰：

數字卦只能解決六位與三位元奇偶數圖形的問題……若卜骨上的數字或線段既非六位，亦非四位或五位，而是十位以上，如扶風縣齊家村西周遺址採集的卜一百零號卜骨，乃由十三位元與十二位元數位組成，這又是何卦呢？《繫辭》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八卦起源於筮數，這是可信的，但若認為這些商周器皿卜骨上的數字或線段一律都是卦，我以為尚需作進一步慎重的考證與研究。⁴³

劉先生的詰問甚為有力，「數字卦假設」無法解釋「三位元」與「六位元」以外的成列符號。若為三位元的倍數（例如：十二位元者），尚能解釋成多組三位元與六位元畫數之間的湊合，但竟然出現無塗抹痕跡的十三位元者（請見圖十一），實在無法再用「數字卦」強加解釋。

（圖九：扶風齊家村採集 108 號卜骨）




（三）純粹陰陽將使數字意義消失

李宗焜先生指出「數字卦」有一到十的數字符號，而《周易》只有陰（--）陽（—）兩種爻畫，故對於「把數字符號匯合於奇、偶兩類，再轉換成陰陽符號」的方式感到疑惑，曾在〈數字卦與陰陽爻〉一文曰：

⁴³ 引自劉大鈞：《大易集說》（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數字卦的數字，依「奇數為陽，偶數為陰」的原則，固然不難對應出易卦

的卦名，但以此方式，「一六八」對應出來的是「

李先生的懷疑是合理的。若根據張政烺的「數字卦假設」原則轉換：每一位置的陰爻，皆能用「二」、「四」、「六」、「八」四個數替換；陽爻也可以隨意代入「一」、「三」、「五」、「七」、「九」這五個數。讓理應會有「 $9*9*9=729$ （種）」的可能性，變成純粹陰陽二爻的「 $2*2*2=8$ （種）」，兩者差異甚大。如果每一個位置的奇偶數之間都能隨意變動，那直接用某種二元符號來表示陰陽即可，何需使用數字？

（四）卦畫、卦名未必屬於同體系

曹礎基先生並不反對「數字卦假設」的前面三個步驟，但對於最後的步驟要「用所得的陰、陽爻來對應《周易》六十四卦」這點，提出了「卦畫」、「卦名」未必相符合的反思：

周原等地出土的甲骨上刻有數圖形畫，被稱為數字卦。……周族興盛後，由周原沿黃河東移，並取代殷族的統治。在文化上導致了殷周文化的融合，接受了比較發達的殷文字，而在占卦上保留了自己原有的文字。……它們只是作某一卦的標誌，標誌了揲著數策時所得出來的數目。這些標誌不便稱謂，因而又得給每一卦安個名目，叫乾，叫坤……。因此，卦畫是舊文字，卦名是後人安的，用的是新文字。新舊文字之間在意義上並不相應，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⁴⁵

曹先生並不反對「此類卜筮符號便是數字」的說法，但特別強調周朝以政治勢力壓倒殷商之初期，有一段文化融合的過渡時期，並就此質疑後人是否真能釐清這些卜筮的標誌符號與名目的關係？「數字卦假設」是否盡得前人之意？此可能還有待討論。

（五）與〈繫辭〉不合

廖名春先生引出今本和帛書〈繫辭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一段，說明。〈離〉與下文〈益〉、〈噬嗑〉等諸卦，都是卦面畫，而非數字卦。

⁴⁴ 引自李宗焜：〈數字卦與陰陽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分（2006年，6月）。

⁴⁵ 引自曹礎基：〈八卦的「秘密」〉，《文史雜誌》第5期（1986年）。

如果是數字卦，「網罟」等則無從談起。……帛書〈繫辭〉絕不會將「中國最早用陰陽爻寫成的」的「帛書六十四卦上的卦畫」說成是伏羲氏之所為。⁴⁶

在眾人皆獨趨於出土資料時，廖先生以傳統文獻提出對「數字卦」的反詰，若古早以數字符號轉換成陰陽成卦，那〈繫辭〉所謂「觀天」、「法地」等文何解？與傳統觀自然、類萬物而作八卦之說大異。⁴⁷

肆、「數字卦假設」對學術界的影響與貢獻

張政烺的發現，使考古學界、古文字界、易學界在 1979 年到 1986 年間，掀起「數字卦」研究熱潮，其結合考古學、古文字學、易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等跨學科知識。徐錫台、李零、李學勤、徐中舒、管燮初、樓宇棟、饒宗頤等學者紛紛撰文發表己見，在此列舉幾個支持數字卦假設的學者：

一、數字卦假設的印證

（一）徐錫台、樓宇棟

此兩學者合作研究，寫成〈西周卦畫探源〉。⁴⁸ 文中認為，周原卜甲上用六個不同的奇偶數組成的重卦卦畫，應該就是西周早期真實的卦畫本形，也是數卜法的反映。他們還舉出民族學家汪寧生在〈八卦起源〉⁴⁹ 之結語：

陰陽兩爻，是古代巫師舉行筮法時，用來表示奇數和偶數的符號，八卦則是三個奇偶數的排列和組合。⁵⁰

由三個相同或不同的數組合而成一個答案，便是一卦，八個答案便是八卦。此例證強而有力地支持了數字卦的假設。

（二）徐中舒

在〈數占法與《周易》的八卦〉一文⁵¹ 討論古代「數占法」（用三個或六個數字組合在一起作為占問吉凶的卦）。言數占與曆數⁵² 關係密切，在舊文獻卻從未被提起。而銅器中只見數占而不見八卦，可知先有數占，後有八卦，指出數占與《周易》八卦關聯密切。

⁴⁶ 引自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周易研究》第 3 期（2000 年）。

⁴⁷ 參閱《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繫辭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 年）。

⁴⁸ 徐錫台、樓宇棟：〈西周卦畫試說〉，《中國哲學》第 3 輯（1980 年）。

⁴⁹ 此文列舉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普遍流行的十七種數卜法。其中，四川涼山彝族所用之法與古筮法類似。

⁵⁰ 汪寧生：〈八卦起源〉，《考古》第 4 期（1976 年）。

⁵¹ 參閱徐中舒：〈數占法與《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 10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⁵² 古代曆數家在《尚書·堯典》中被稱為羲和，掌天文曆法。

（三）李學勤

若將南宮中鼎銘文以「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數字卦解。則可得剝（山地䷖）之比（水地䷖），乃五、上二爻變。對此，李學勤依照朱熹《易學啟蒙》：「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的說法，認為這是個大吉大利的卦⁵³，證明銘文的內容是能用數字卦對應《周易》文字來印證的。⁵⁴

上述學者用實例應和了張政烺的數字卦假設，但也都未能直接證明此類符號與《易》之間的必然性。

二、數字卦的引申

經過上述等學者的說法支持，強化了數字卦的合理性，卻未有更充分的証據使之成定論，仍有不少質疑和反對意見。⁵⁵ 但不論如何，「數字卦」一詞已具備了普遍的概念，雖未有明確定義，但已被廣泛使用，並用來衍生其他議題。舉例如下：

李立新〈河圖洛書與漢字起源〉：

先民用原始的結繩數字進行占卜，不同的數字卦代表著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間的相互連繫，可以說「數字卦」粗略地具備了文字的功能。⁵⁶

劉雨鷹〈商周數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對張政烺先生易卦源於筮數論的初步証偽〉：

「數字卦」筮法問題是先秦、秦漢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的深層基礎性問題。⁵⁷

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

數字既可成卦，而卜卦又是上古社會神道社教的具體反映，那麼運用數字來探討宇宙的奧秘，和《易經》就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⁵⁸

由此三例可以看見學者們對於「數字卦」已有一個明確概念。將「數字可成卦」、「數字卦的確存在於古代」等觀念當作已成立的基準，而再以此為立足點去探討其他命題。

⁵³ 剝卦二變爻的爻辭：「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⁵⁴ 參閱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中方鼎與周易》（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年）。

⁵⁵ 劉大鈞、李宗焜等皆對數字卦成立與否問題提出疑問。

⁵⁶ 李立新：〈河圖洛書與漢字起源〉，《周易研究》第3期（1995年）。

⁵⁷ 劉雨鷹：〈商周數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對張政烺先生易卦源於筮數論的初步証偽〉，《懷化師專學報》第1期（2000年，2月）。

⁵⁸ 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周易研究》第5期（2006年）。

三、「數字卦」對學界的影響

數字卦給學界帶了相當的啟發，開闢了易學新的研究途徑，對於此學風方向的改變，山東大學的賴祖龍在其碩士論文中歸納了五點⁵⁹，如下：

- （一）將歷史上難以辨識的「奇字」、「符號」解釋為「筮數易卦」（通稱「數字卦」）。從薛尚功、李學勤的猜測到唐蘭、張政烺的全面搜集材料和系統論証，乃至於後賢三十多年來的求索研討，基本立論都是將這些「奇字」、「符號」解釋為「筮數易卦」。
- （二）「筮數易卦」的發現使學界重新關注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先後問題，周文王之前已經出現數字卦，說明周文王之前已經有重卦現象，文王重卦問題的研究也重新受到重視。
- （三）學界對於「筮數易卦」筮法與大衍筮法關聯探討取得了較大成就。李學勤、汪顯超等先生曾有過精闢的分析。
- （四）關於筮數與周易陰陽符號探討取得較大成就。
- （五）數字卦與周易卦序研究也引起學界重視。

由賴祖龍的整理可知，數字卦提出後，學界研究方向主要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先後」、「文王重卦」、「數字卦筮法與大衍筮法關聯」、「筮數與周易陰陽符號」、「周易卦序」等五個面向。

⁵⁹ 賴祖龍：《筮術易卦源流研究》，頁 4-5。

〔參考書目〕

一、古籍

- 1.〔漢〕班固《漢書》（湖南：岳麓書社，2001年）。
- 2.〔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2001年）。
- 3.〔唐〕孔穎達等《周易正義》，收錄於《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4.〔唐〕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收錄於《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5.〔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84年）。

二、近人專著

1.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紀要〉，《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8月）。
2.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3. 徐錫臺：《周原甲骨文綜述》（陝西：三秦出版社，1987年）。
4. 張立文：《周易帛書今注今譯》（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
5. 錢寶琮：《中國數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
6. 黃錫全：《古文字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
7. 劉大鈞：《大易集說》（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兩周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10. 張政烺：《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11. 駢宇騫、段書安編：《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12. 徐利治等：《中國古代數學思想》（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

三、碩博士論文

1. 賴祖龍：《筮術易卦源流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四、單篇論文

1. 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青銅器上的卦爻辨識〉，《古文字研究》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2. 徐中舒：〈數占法與《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3. 曹礎基：〈八卦的「秘密」〉，《文史知識》第5期（1986年）。
4. 戴璉璋：〈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貢獻〉，《國文天地》（1988年）。
5. 李立新：〈河圖洛書與漢字起源〉，《周易研究》第3期（1995年）。
6.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數術書簡論〉，收錄於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2-30。
7. 魏安明、趙文壇：〈八卦是一種古老的數字符號〉，《山西教育學院學報》第2期（1999年6月）。
8. 劉雨鷹：〈商周數字卦之用六象筮法考——對張政烺先生易卦源於筮數論的初步証偽〉，《懷化師專學報》第1期（2000年2月）。
9.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周易研究》第3期（2000年）。
10. 黃師忠天：〈漫談歷代出土文物對易學研究的影響〉，《中華道教學院南台分院學報》第1期（2000年9月）。
11. 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文物》第11期（2002年）。
12. 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第5期（2003年）。
13. 廖明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周易研究》第5期（2003年）。
14. 于蒹：〈包山楚簡的數字卦〉，《北方論叢》第2期（2005年）。
15. 賴貴三：〈說「易」在上古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第十四次讀書月會》（2005年）。
16. 史善剛：〈數字卦與簡帛易〉，《中州學刊》第6期（2005年11月）。
17. 王化平：〈數字卦兩點思考〉，《求索》（2005年12月）。
18. 鄭吉雄：〈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周易研究》第5期（2006年）。
19. 李宗焜：〈數字卦與陰陽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分（2006年6月）。

